

陈庆先：手编草鞋送女儿重走长征路



陈庆先（前排右二）夫妇和子女们。
记者胡冬冬 翻拍

“这3枚弹片，在父亲的身体里藏了50年。”7月中旬，河北省怀来县一小区内，陈庆先将军次子陈永安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锦盒，向记者展示1984年将军骨灰火化后清理出的遗物。

陈庆先，1908年12月出生，1932年参加红军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，担任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

“父亲身上有一种本能的反抗精神。”陈永安说，父亲青少年时代饱受压迫、颠沛流离，直至投身红军，才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作战勇猛，参军一个多月当上红军排长

黄陂区罗汉寺街道陶田村陈排湾东南角，绿树掩映中，有一栋青砖黑瓦的民居，这里是经过修缮的陈庆先故居。

76岁的陈永安回忆：“房子是后来修的，我爷爷是地主家的长工，奶奶是佣人，还要帮地主家带孩子，父亲小时候住的是茅草房，六七岁就给地主家放牛。”

陈庆先小时候很不理解：“为什么地主家的孩子要我妈妈带，我却要干活，我也是孩子，也该有人疼、有人带。”

“父亲当时的不解，就是‘反抗精神’的萌芽。”陈永安说，父亲17岁那年，再也不愿意在地主家扛活了，想到外面闯一闯，便跟着一位族叔到汉阳学裁缝，几个月后又经人介绍，进了武昌裕华纱厂。

陈庆先在纱厂发现，工人拼命干活却拿不了几块钱，受欺压还被拖欠、扣罚工资。他参与工人运动，要求工厂提高工人待遇，结果被纱厂开除了。

之后，陈庆先做过印刷工、卖水工、黄包车夫，还在地方军阀部队里当过兵。辗转漂泊的日子里，他痛恨旧社会的黑暗，愈发渴望找到改变命运的道路。

1929年，陈庆先跟着伯父去往四川万源，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，靠做点小生意糊口。但因当地军阀连年混战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“生活还是不支”。

1932年12月，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东北的通江、南江、巴中地区，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，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。

“在万源，父亲接触到红军和革命思想。”陈永安介绍，1932年冬，父亲在万源卖货时，偶遇在红军工作队的表兄杜顺田，在其启发引导下，放下货郎担子参加了革命。

“红军进入四川后，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杀贪官污吏，取消苛捐杂税，我深受触动。”陈庆先生前曾向子女讲述，那时，他下定决心加入红军，是看到了“共产党能帮穷人翻身，让穷人能吃饱饭、能分到田地”。

陈永安讲述，父亲投身革命后作战勇猛，又因在军阀部队学习过文化和军事课程，走南闯北见多识广，一个多月

后，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排长。

1933年2月，四川军阀重兵围剿川陕苏区。万源县梨树溪战斗中，陈庆先冲锋时胸部和手臂被土枪击中。受限于简陋的战地医疗条件，胸部的铁砂、弹片未能取出。

1933年7月，陈庆先“经过六个多月的革命斗争，对革命道理进一步理解，为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……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”，25岁的他获批正式入党。

两个月为红军补充新兵2400余人

陈庆先长征时的一项重要职责是在跟随部队转战途中发动群众，建立革命政权、稳固后方，保障主力作战。

“长征中，父亲不光是战士，还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地方行政、后勤保障和群众动员上，曾先后担任中共万源、阆中、梓潼县委书记。”陈永安介绍，父亲在万源工作时，许多妇女要求加入红军。父亲请示上级后，专门扩充了一个妇女连，负责护理伤病员、做被服、烧饭等工作。

1934年夏，万源保卫战打响，这是保卫川陕苏区的关键一役。战事胶着、物资紧缺，作为万源县委书记，陈庆先组织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，发动群众抢运粮草、修筑战壕，动员青年火线参军，全力支援前线，稳固后方。

1935年3月28日，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，此役历时24天，歼敌约1.2万人。渡江成功后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转移，踏上长征之路。局势改变，新的根据地亟待开拓，陈庆先临危受命，先后调任阆中、梓潼县委书记。

每到一处，陈庆先都快速扎根落地，组织群众打土豪、分田地，组建基层苏维埃政权。彼时，川北历经连年战乱，民生凋敝，粮食极度紧缺，筹粮支前不易。

面对重重困难，陈庆先分类施策：对普通群众自愿征购物资，对开明乡绅晓之以理、借粮支援红军，对顽固劣绅坚决没收其剥削所得。

陈永安介绍，长征开始后，父亲在

两个多月的时间为红军筹集了大批粮食、物资，并为红军补充新兵2400余人。他晚年说，那时就认识到：“人民群众支持红军，红军才能打胜仗。”

陈庆先亲自动员参军的红军战士，很多永远倒在了长征路上，其中不乏十几岁的青年。陈永安回忆，父亲晚年常常失眠，即便服用安眠药也难以安睡，“做梦都是那些娃娃的脸”。

1935年5月上旬，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岷江流域西进，进入包括阿坝、金川在内的川西藏族、羌族、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，陈庆先先后担任卓克基、阿坝、绰斯甲特区委书记，金川省委组织部部长。

当时，因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恶意宣传，川西群众对红军有误解，纷纷躲进深山。

红军初进川西筹粮时，都是用布匹或盐巴跟群众换取，群众家中没人，就不能自取。

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剧团宣传员孟瑜后来回忆，队伍行至一个村庄时，被居民家中酥油香味吸引，他们好多天没吃过饱饭，但居民家中没人，谁也没动酥油，大家还专门找到一块木板，把酥油桶盖严实。

为寻访居民，陈庆先和战友们翻山越岭，依靠通司（翻译）宣传革命主张，他自己也主动学习藏语，带头帮藏民下地劳作，逐渐赢得了群众信任。

在陈庆先的发动下，藏族群众甲尔格·捷克生投身革命，担任格勒得沙绰斯甲县革命政府主席，配合红军3次击退土司武装进攻。红军北上后，他被反动匪徒杀害，壮烈就义前高呼“红军一定要回来”。

翻雪山救下的“红小鬼”后来成了将军

陈庆先曾跟随红四方面军部队三过草地、数次翻雪山，直至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，他才走完了长征路。

“父亲在长征中救过的一个‘红小鬼’，1961年成了开国少将。”采访中，

陈永安讲述了翻雪山时的一段故事。

雪山上空气稀薄，气候变幻无常，红军长途艰苦跋涉，缺衣少食，很多战士长眠雪山。

1936年6月，陈庆先牵着马、带着队伍爬夹金山时，走到半山腰，突然听到极其微弱的呼救声。他四处寻找发现，有一名小红军倒在雪堆里奄奄一息。他赶忙叫警卫员帮忙把人从雪堆里挖出来，用自己的马把小红军驮过雪山。

20世纪70年代，陈庆先经历一场大病后，在济南家中休养。一天，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的任思忠少将登门看望他。一进门就喊：“恩人，恩人啊！”秘书告诉陈庆先：“任副政委来看您啦。”陈庆先疑惑地表示：“我不认识任副政委啊，他为什么来看我？”

任思忠说出夹金山上的往事，说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。陈庆先才回想起来。

11枚铁砂、弹片留在体内50年

长征万里征途，鞋子是最大的损耗品之一。当时物资匮乏，哪里能人人穿布鞋？很多红军将士穿草鞋。陈永安回忆，父亲多次给子女讲过长征途中“打草鞋”的故事。

打草鞋是红军的必需技能，红军安营扎寨后的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找草料、打草鞋。路边细长的杂草、捡来的破布条子，都是打草鞋的原料。

陈永安回忆，1966年，在西安读军校的大姐陈君给父亲写信，说她和同学们要重走长征路。父亲收到信后很高兴，要给大姐打草鞋。

陈庆先当时因病在武汉休养，住在武昌区紫阳湖附近。他找到附近农户，要了一些稻草编起了草鞋，编完了还亲自试穿。父亲还跟母亲开玩笑说：“这么多年没编过草鞋了，手还不生。”

“看到父亲编草鞋，读中学的二姐也吵着要，父亲一共编了三双草鞋，大姐两双，二姐一双。”陈永安说。

陈庆先次女陈青回忆，父亲因身体原因，给她打的草鞋，其实只完成了一只。

1984年1月19日，陈庆先在济南逝世，享年76岁。陈永安回忆，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曾嘱咐他们：“明早给我做一碗小米糊糊，加点青菜，带点咸菜。”

8月初，记者在位于黄陂的长乐园陵园将军园看到，将军和夫人的半身铜像雕塑掩映在葱郁树木之间，将军戎装肃穆、风骨凛然，夫人神态温婉、安然相伴。

陈庆先逝世后，子女遵其遗愿，将他的骨灰送回黄陂老家安放。陈永安哽咽着回忆：“我们从父亲的骨灰中清理出铁砂、弹片共计11枚，留在父亲体内长达50年。我们把一些捐给了博物馆，3枚弹片保留在家中。”

记者孙笑天